

中国

陈超
著

先锋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诗歌论

○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生存的想像力之光○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精神向度：对五组『两难』境遇的整合
○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正典』与创造生成的『理解』○文学的『求真意志』
○『X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独轮车○让诗与真互赠沉重的尊严○大地哀歌和精神重力
○『让蒙面人说话』○『反诗』与『返诗』○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精神肖像与潜对话

ISBN 978-7-02-006058-0



ISBN978-7-02-006058-0 定价：22.00元 9 787020 060580 >

中国**先锋**诗歌论

陈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序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历史语境中的诗与思”，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下，先锋诗歌发展中的几个彼此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下篇“先锋诗历时性线索中的‘范型’”，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先锋诗歌发展史上的几位标志性、代表性的诗人的研究，并试图在论述时以个案带出史的线索。笔者希望做到专业性和可读性，学理性和时效性并举，勾勒和阐释中国先锋诗歌发展的概貌，为此后对先锋诗歌做进一步的历史和美学评价，提供相对可靠的起点或某一角度的参照。

诗学文本介入当下写作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是我写作此书的动力。在写作这些诗人专论和理论探讨文字时，我会不断回想起中国先锋诗歌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至今所走过的激动人心的道路。同时，我也清晰地感到，从价值确认，诠释模式，运思向度，到措词特性上，自己的批评方法也正在经历着一个较大的转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诗歌批评或是贴近社会学和文化阐释，或是固持于形式研究，或是专注于审美感受的鉴赏。这些批评文本各有佳境，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它们之间很少被真正有效地打通。当然，诗歌于社会、历史、文化大有关系，其“本体形式”也是诗之为诗的存在理由。但是，说到底，真正有力的诗学，探讨的应是综合性的事关“写作”诸方面的问题。而要对“写作”这个大概概念进行整体的考察，则应当树立“内容是完成了的形式，形式是达到了目的的内容”或

“舞蹈与舞者不能分开”，这个不能简单二分的、求实准确的理念。缘此，到90年代，围绕“诗歌写作”问题，笔者感到了以往批评中将本体与意义“分治”的做法是“不顺手”和“不够用”的，遂开始尝试转入一种难以归类的“综合批评”。

本书的写作试图体现出由“分治”向“综合批评”意识的转型。笔者提醒自己，要同时保持对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使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人研究，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语言、技艺、生存、生命、历史、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所谓“历史语境中的诗与思”，就是使理论批评文本，不但要具有介入当下创作的有效性，而且最好还能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历史话语想像”的参与。我认为，自觉地将对美学的省察与对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从人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去把握诗歌的活力和美，使语言不再作为修辞学意义上的“美文”，而是人与生存之间真正的临界点和困境来考察，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诗学富于活力的标志。虽然笔者做得尚不够理想，但却清晰地感到了这个转变给自己带来的较为开阔的批评视界。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是当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现象。它为我国诗学界提供了很大的诠释和理论批评负荷，也是国际汉学界很热衷的研究课题。然而，多年来对它的研究，宏观的潮流概括多，重要诗人的个案分析不足；社会学、文化批评多，“向心式”的文本细读及话语研究不足；用一般的现代诗歌写作通则硬性归类多，对诗人个体艺术趣味和风格探究不足；重复使用流行的有限资料做论据的多，掌握第一手资料（如阅读各重要流派、诗群的民间出版物，做诗人访谈）展开深入研究的不足。

基于对上述缺失的认识，笔者在增补阅读了大量诗歌民刊资料和诗人访谈的基础上，按照中国先锋诗歌发展的历时性线索，选择了几位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作特点，具有“范型”意义的重要先锋诗人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创作道路，文本构成特性，在流派诗群中的意义，诗艺传承系谱，及持续处理的重要诗歌母题……力求言说有据地论述诗人的精神及审美创造力形态，评价其写作技艺对诗歌界的

影响,并与诗人展开批评或磋商的“潜对话”。

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以及先锋诗歌的“新感性”本质,笔者在写法上采取了理论论述、文本细读、审美感兴的描述、一手史料评介(包括有助于了解诗人创作的个人生平、个人性情、“掌故”)相结合的方法,在保持专业深度的前提下,追求行文的清畅可读和一定的趣味性。

在对理论批评姿态或对批评家角色的确认上,笔者试图体现出职业自觉,提醒自己理论批评相对的自立性,亦即理论批评与创作的“平行”和“对话”关系。批评为了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有必要重新确立自己。诗学批评不是诗歌创作的单纯的附属和辅助,批评家也不是诗人的“仆从”或“西席”。如果说过去曾经如此,那是由于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批评没有合理、合法地建立起来。批评与创作的合理关系只能是平行和对话,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应具有既深刻介入创作而又能独立于创作的精神和书写能力。对批评价值、职能和过程的一定程度的自觉,使笔者得以以较为敏锐和自如的心境,提出某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感到了诗歌批评在获具相对的自立后,焕发出的自身的活力与魅力。

罗兰·巴尔特在《批评与真实》一书中揭示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如今许多有效的批评家也成了“作家”。这个说法可能会使那些“学院派”理论家蹙额,但若是我们换一种表述,就会看到它骨子里的真确性。按照巴尔特的说法,“作家”不应以他所书写的文类为特征,而只应以某种“言语的自觉性”为特征,他体验到语言的深度,而不只是它的工具性或美感。以前,批评与创作是被一个古板的神话隔离了,而今天的作家与批评家处于同样缠绕——也很可能是欢愉——的写作环境中,挖掘着同一个对象:语言。我很认同巴尔特的说法,这种意识不仅仅会影响到理论批评话语的表面的修辞效果,而且还注定会激发出批评家的陌生的思考,异样的书写欢愉和情感经验的冲撞力。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诗学理论批评,不仅仅要做到“达意”,同时其本身也应作为一种揭示生存和语言奥秘的创造性的“写作”。在挖掘语言的某些过程中,我确实曾享受过创造的快乐。

上述言及的,更多是笔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希望遵循的意识。希望做到和真正做到肯定还不是一回事。笔者究竟做到了怎样的程度,还要请读者批评指教。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杜栖梧女士,由于我的驽钝,是她完成了全部的文字输入(我近年出版的其他著作同样如此),并同步修正了书中某些文句的错讹。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无怨无悔地帮助我,我的感激和敬意是无法言说的。

陈 超

记于 2006 年 12 月 1 日

目 录

自序	1
----------	---

上篇 历史语境中的诗与思

第一章	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生存的想像力之光	
	——先锋诗歌二十年,一份个人的回顾与展望	3
第二章	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	28
一	深入当代	28
二	可能的诗歌写作	31
三	另一种火焰或升阶书	35
四	大众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诗歌写作	41
第三章	精神向度:五组“两难”境遇的整合	45
一	个体主体性对整体生存的包容	48
二	“不纯”中生命的“纯粹”	51
三	让语言本体与功能同时“到场”	56
四	虚无与充实的现代转换	61
五	“漂泊与定居”互为表里	66
第四章	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	
	——先锋“流行诗”的反文化、反道德问题	71
第五章	“正典”与创造生成的“理解”	
	——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	79
第六章	文学的“求真意志”	
	——对现代性写作的价值基点的思考	86

下篇 先锋诗历时性线索中的“范型”

第七章	“X 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	
	——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诗歌论	97
一	郭世英：向生存向艺术掷出的“X”	99
二	张鹤慈：“挣断了蛛网般的血管……”	112
三	张郎郎：“太阳纵队”的大顽童骑士	123
第八章	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独轮车	
	——食指诗歌论	136
第九章	让诗与真互赠沉重的尊严	
	——北岛诗歌论	161
第十章	大地哀歌和精神重力	
	——海子诗歌论	186
第十一章	“让蒙面人说话”	
	——西川诗歌论	213
第十二章	“反诗”与“返诗”	
	——于坚诗歌论	255
第十三章	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	
	——翟永明诗歌论	286
第十四章	精神肖像与潜对话	
	——十位新生代诗人简论	319
	结束语	356

上 篇

历史语境中的诗与思

第一章 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 生存的想像力之光

——先锋诗歌二十年，一份个人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先锋诗出现了从意识背景到语言态度的重大转换，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它带来的持久影响。如何描述这一转换的性质，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其中最通常的方式是按照历时的诗歌史线索，对朦胧诗之后出现，但在创造力形态上彼此间差异性很大的先锋诗潮（它们被习惯性称为“新生代”“第三代”“后朦胧诗”），分别做出“事实指认”。目下大部分相关的理论批评著述，依循的就是这样历时呈现分别予以“事实指认”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其学理上的审慎或有效性，材料上的丰富和准确，但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

作为诗歌批评和创作的双重从业者，我真正进入先锋诗歌范畴，恰好也是二十年。就理论批评而言，本人以往对先锋诗潮流向的研究，基本也未曾逾出历时性的分别予以“事实指认”的方式。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条连贯的、与诗的意味与形式均密切相关的论述线索。批评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既可以彼此激发，也可能相互掣肘，其间种种情态冷暖自知。但这种双重身份明显的好处是，它让我始终保持了对先锋诗歌本体与功能的平衡关注，而不是偏执于一端。

基于这种“平衡”意识，近年来我思考的线索就是先锋诗歌的“想像力”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所采取的不同的转换方式。它们为什么

会转换？是怎样转换的？其合理性和缺失在哪里？诗歌的“想像力”，就是诗人改造经验记忆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对诗人想像力方式的发生和发展的探询，会拖出更为深广的关联域，它事关诗人对语言、个体生命、灵魂、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表达。围绕这一点进行的历时性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在对二十年来先锋诗歌的回顾和展望时，不至于“事实指认”有余，而价值判断不够足。

我认为，二十年来先锋诗歌的想像力是沿着“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生存”这条历时线索展开的。其最具开拓性的价值也在这里。当然，这里所谓的“价值”，是根据我个人的审美趣味、生存立场做出的。因此，本章副标题中出现的“个人”，绝非是妄自尊大或自矜，只不过是昭示出一个个人的视点，并期待同行的驳难补充与修正。

对于保持着冷静的人们来说，80年代初期发展到成熟的涌流阶段的“朦胧诗”——正如本书下篇所描述的，其文脉滥觞可上溯到60至70年代后期的“X小组”“太阳纵队”“白洋淀诗群”“《今天》诗群”——只是“广义”的先锋诗歌，而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先锋派诗歌，在他们那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曾被中断了的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主义、民主主义、浪漫主义诗歌的变格形式。在朦胧诗人的代表性作品中，其想像力向度与五四精神有诸多的同构之处。因此，朦胧诗的想像力主体是一个由人道主义宣谕者，红色阵营中的“右倾”，话语系谱上的浪漫主义、意象派和象征派等等混编而成的多重矛盾主体。在他们的“隐喻—象征，社会批判”想像力模式内部，有着明显的价值龃龉现象。但也正是由于这种龃龉所带来的张力，使朦胧诗得以吸附不同历史判断及生存和文化立场的读者，不同的诠释向度。所以，在80年代初期，虽然朦胧诗受到那些思想僵化的批评家的猛烈抨击，但这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其站稳了脚跟。其原因就是由于它在社会组织、政体制度、文化生活方面，与中国精英知识界“想像中国”的整体话语——“人道主义”“走向现代化”——是一致的。

1984年后，“朦胧诗人”开始了想像力向度的调整或转型。北岛

由对具体意识形态的反思批判,扩展为对人类异化生存的广泛探究。杨炼更深层地涉入了对种族“文化—生存—语言”综合处理的史诗性范畴。多多更专注于现代人精神分裂和反讽的主题。芒克则以透明的语境(反浪漫华饰)迹写出昔日的狂飙突进者,在当代即时性欣快症中,作为其伴生物出现的空虚和不踏实感。这四种向度,是1984年后“朦胧诗”最有意义的进展。同时,它也昭示出作为潮流出现的“朦胧诗群”的解体。

“朦胧诗”更新了一代人的审美想像力和生存态度。从早期正义论意义上“民主、自由”新左翼圣礼式的精神处境的渐次淡化,到后期几位诗人对现代主义核心母题的迫近,我认为,其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休戚相关地预兆了新生代诗歌的发展。因此,简单地将新生代诗歌看做“朦胧诗”的反对者,是一种过于幼稚的说法——无论是曾经说过,还是今后打算这么说。

但是,作为诗歌发展持续性岩层的断面,新生代诗歌的想像力模式与“朦胧诗”的确不同。由此否定“朦胧诗”是肤浅的,而超越它(包括“朦胧诗人”后期创作的自我超越)则是诗歌发展的应有之义。1985年前后,新生代诗人成为诗坛新锐。随着红色选本文化树立的卡理斯玛(charisma)的崩溃,和翻译界“日日新”的出版速度,这些更年轻的诗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共时”亲睹了一个相对主义、多元共生的现代世界文化景观。在意识背景上,他们强调个体生命体验高于任何形式的集体顺役模式;在语言态度上,他们完成了语言在诗歌中目的性的转换。语言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意义容器,而是诗人生命体验中的惟一事实。这两个基本立场,是我们进入新生代诗歌的前提。

这里,我借用两句大家熟悉的古老神谕,来简捷地表述这种不同:

理解你自己:“朦胧诗人”在这里意识到的是社会人的严峻、承担、改造生存的力量。新生代诗的主脉之一“口语诗”却更多地意识到,“你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生命,不要以“神明”自居(包括不要以英雄、家族父主及与权力话语相关的一切姿势进入诗歌)。

太初有道:“朦胧诗人”在这里意识到的“道”,是人文价值、社会理想目标、核心、主宰。新生代诗人则更多地意识到这个语词的原始

本真含义:道,the word(字、词);新生代另一主脉,具有“新古典”倾向的诗人,则追寻超越性的灵魂历险,而非这个词语具体的社会性指涉。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广泛涌流的“新生代诗歌”,只是对朦胧诗之后崛起的不同先锋诗潮的泛指,也可以说,它是“整体话语”或曰“共识”破裂后的产物,其内部有复杂的差异。但是,从诗歌想像力范式上看,它们约略可以分为两大不同的类型:日常生命经验型和灵魂超越型。当然,这两种不同的范型也并非简单地对立或互不相关,特别是到90年代中期,彼此间的“借挪使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个特点,容我在下一部分细加论述。

对日常生命经验的表达,主要体现在对朦胧诗的“巨型想像”的回避上。这使得新生代诗歌之一脉,将诗歌的想像力“收缩”到个体生命本身。这种“收缩”是一种奇妙的“收缩”,它反而扩大了“个人”的体验尺度,使“我”的情感、本能、意志和身体得以彰显。1985年之后,引起广泛关注的“他们”“非非”“莽汉”“女性诗”“海上”“撒娇”“城市诗人”“大学生诗派”等等,都具有这一特性。从题材维度上,他们回到了对诗人个人性情的吟述;从形式维度上,他们体现了对主流方式和朦胧诗方式的双重不屑;从心理维度上,他们表达了镇定自若的“另类文化”心态;从语言维度上,他们大多体现了口语语态和心态合一的直接性,其语境透明,语义单纯。最终,从想像力范畴看,他们力求表述自我和本真环境的“同格”。

限于篇幅,且以韩东的一首短诗为例。如果说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更像是第三代诗人反对“巨型想像”的“写作宪章”的话,那么真正能代表他想像力向度和质地的,还应是表现日常生活的诗作。比如《我听见杯子》:

这时,我听见杯子
一连串美妙的声音

单调而独立
 最清醒的时刻
 强大或微弱
 城市，在它光明的核心
 需要这样一些光芒
 安放在桌上
 需要一些投影
 医好他们的创伤
 水的波动，烟的飘散
 他们习惯于夜晚的姿势
 清新可爱，依然
 是他们的本钱
 依然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使他们度过纯洁的一生
 真正的黑暗在远方吼叫
 可杯子依然响起
 清脆，激越
 被握在手中

这里，一次普通的朋友聚饮，被诗人赋予了既寻常又奇妙的意味。它是“单调而独立”的，但同时又是“最清醒的时刻”。对日常生活中细微情绪的准确捕捉的“清醒”，对语言和想像力边界的“清醒”。诗人不是没有感到“真正的黑暗”和“创伤”，只是他不再在意它。与朦胧诗的“我不相信”相比，新生代诗人已是“习惯于夜晚”，并自信个体生命的“清新可爱”这一“本钱”。这是一种既陌生又古老的本土化的诗歌想像模式，它排除了形而上学问题，不论这些问题被认为是此刻不能解决的，还是根本永远无意义的。

总之，在上述所言的几个新生代诗歌“社团”中，尽管有情感和意志强度，语型和素材畛域的不尽相同，但就其想像力范型和“自我意识”看，却具有“家族相似性”——抑制超验想像力，回到个人本真的生命经验。

除去“影响的焦虑”因素,这种想像力转换的发生与诗人对“语言”的重新探究有关。在日常生命经验想像力范型的诗人中,于坚是具有自觉的理论头脑的人物。他用“拒绝隐喻”,表达了对这一审美想像力转换的认识。从单纯的理论语义解读看,这一理念肯定是成见与漏洞重重。但是对诗人而言,在很多时候,恰好是成见与漏洞构成了他鲜明而有力的存在。“拒绝隐喻”,从根源上说,是语言分析哲学中的“语言批判”意识,在诗学中的“借挪使用”。或许在这类诗人意识中,语言是表达本真的个人生命经验事实的,而“隐喻”预设了本体和喻体(现象/本质)的分裂,它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指向和建立总体性认知体系的企图。这与新一代诗人主张的“具体的、局部的、片断的、细节的、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和0度的”^①诗歌想像力模式,构成根本的矛盾。按照语言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表述就是:“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如果在诗人限定的想像力范畴中,语言应该表述经验事实的话,那么超验的题旨,既无法被经验证明,又无法为之“证伪”,那就当属“沉默”的部分,可以在写作中删除了。

于坚本人及第三代诗人的某些代表性作品,其特殊魅力的确受益于这个理念。经由对隐喻-暗示想像力模式的回避,他们恢复了诗歌与个体生命的真切接触。但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对常规意义上的现代诗“想像力”的抑制,有时可能会激发扩大了读者对“语言本身”的想像力尺度。在这点上,恰如法国“新小说”的阅读效果史,它们回避了对所谓的“本质”“整体”和“基础”的探询,但这种回避不是简单的“无关”,它设置了自己独特的“暗钮”,打开它后,我们看到的是景深陡然加大的第三代人与既成的想像力模式的对抗。在对抗中,一个简洁的文本同样吸附了意向不同的解读维度,“每一个读者面对的不像是同一首诗”。这也是“他们”“非非”“莽汉”“海上”“女性”等等诗群,与80年代同步出现的“南方生活流”诗歌的不同之处。后者仅指向单维平面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现实主义”生活题材,而前者却指向对先锋诗歌想像力范式的转换实验。

^① 于坚《拒绝隐喻》,见吴思敬编《磁场与魔方》第31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